

## 欠发达国家的资本所有者、腐败与贸易政策

陈 超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厦门 361005)

【摘 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欠发达国家出现了政治民主化与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先行研究表明, 在这些国家与地区中, 政治民主化与贸易开放性政策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然而, 本文认为, 尽管民主为劳工开辟了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度性渠道, 但是他们在集体行动的困境下, 仍然难以有效地组织起来。相反, 由于具有组织规模小、选择性激励充沛等优势因素, 国内相关行业的资本所有者更具有影响政策的能力。诚然, 资本所有者向政府施加影响的方式是多样的, 而“腐败”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因此, 本文借助“腐败”作为测量资本所有者影响政府的代理性变量, 以 1995 年至 1999 年全球欠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为基础, 分析指出, 在其他变量恒定的情况下, 资本所有者影响越大, 即一个国家腐败程度越高, 该国贸易政策越闭塞。由此可见, 民主制度本身同一国最终的贸易政策并不具有直接的相关关系。本文的一个基本启示在于, 正式制度的变迁并不一定会带来行为的变化。它至少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 即制度的成熟度与社会接受度。因此, 比起考察正式制度下可能产生的行为激励, 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制度背后的实际“政治运作”。

【关键词】欠发达国家 民主化 贸易自由化 资本所有者 腐败

1992 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称,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这种趋势可以概括为, 从直接干预向放松管制的转变, 以及从内向型贸易政策向外向型贸易政策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贸易政策的变化, 正伴随着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浪潮。<sup>①</sup> 这种“双重自由化运动”现象, 使民主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 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在众多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 对于这二者关

系最显著的发现是, 民主化与一国贸易政策的开放性呈正相关关系。持此种观点的先行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部分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 民主制度下维护产权保护、生产规制与法律实施的制度, 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贸易产品的质量, 从而有利于推动一国贸易政策的开放程度;<sup>②</sup> 另一部分学者则从政治学的角度指出, “选票”从由少数精英控制变成由多数劳工掌握, 这才是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根源。<sup>③</sup>

【作者简介】陈 超,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

- ① H. V. Milner, and K. Keiko, “Why the Move to Free Trade?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 (2005, Winter): 107 - 143.
- ② 参见 R. J. Democracy Barro,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1 (1999): 1 - 27; G. Clarke, “How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Economic Factors Impact Technological Deepe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3 (2001): 1097 - 1118; D. Berkowitz, J. Moeinius, and K. Pistor, “Trade, Law, and Product Complex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8.2 (2006): 345 - 352; A. Levchenko, “A.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4 (2007): 791 - 819.
- ③ 参见 Haan, J. de and Jan - Egbert S., “Does More Democracy Lead To Greater Economic Freedom? New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 (2003): 547 - 563; A. Baker, “Why Is Trade Reform So Popular in Latin America? A Consumption - Based Theory of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World Politics* 55.3 (2003): 423 - 55; F. Giavazzi, and Tabellini 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2 (2005): 1297 - 1330; H. V. Milner, and K. Keiko, “Why the Move to Free Trade?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 (2005): Winter: 107 - 143; M. J. Yu, “Trade, Democracy and the Gravity Equ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1 (2010): 289 - 300.

这两类文献存在的共同问题在于:它们都没有对相关主体的力量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第一类文献虽然展示了为什么民主有利于开放型的贸易政策,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更愿意选择实施开放型的贸易政策;而第二类文献则在过分强调劳工力量的同时,低估了资本所有者对政策的影响能力。笔者认为,在欠发达国家<sup>①</sup>中,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劳工力量的提升,影响一国贸易政策的主体依然是资本所有者。在影响政府的多种途径中,政商之间的“腐败”关系,是资本所有者影响政府官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本文以“腐败”为代理变量,用来测量资本所有者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力度。通过对1995年到1999年全世界所有欠发达国家面板数据的考察,本文指出,一个国家腐败程度越高,即一个国家资本所有者影响力越大,该国贸易政策的开放性程度越低。

## 一、文献回顾

概括地说,先行研究主要通过两种机制,论证民主与贸易开放之间的正相关性:这两种机制分别是:民主制度对经济活动产生作用的机制,以及民主制度对官员行为选择产生影响的机制。

### 1. 机制1:民主通过改变经济活动影响贸易政策

总的来说,这类文献聚焦于与民主伴生的相关制度的作用。该领域的学者强调,与民主伴随产生的制度,在促进国际贸易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通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交易成本得以实现。克拉克<sup>②</sup>(Clark)认为,一个高度民主化的政体,通常拥有一套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力制度,这对于产品研发的投入与产出至关重要。因此,他认为民主制度对贸易促进作用的机制在于,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完备制度下,对产品研发成果的保障可以有效提升本国产品的质量,从而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利夫申科(Levchenko)从另一个方面指出,出口国民主

化程度越高,国际社会对该国产品的信任度越高。因而国际交易成本便可以通过民主制度得到大幅降低。<sup>③</sup>安德森与马库勒(Marcouiller)以及伯科维茨(Berkowitz)等人则批评认为,民主制度对一国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是通过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得以实现,而非通过降低国际交易成本实现。<sup>④</sup>

的确,民主及其伴随而产生的一些制度,为一国开放性贸易政策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必要条件与保障。然而政策的产生并非在真空中完成,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多种利益主体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一项最优的选择并不一定是一个国家的最终选择。从这点考虑出发不难看出,这一类文献虽然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主制度有利于贸易开放,但是无法说明为什么一个民主的政府会最终选择开放性的贸易政策。正是这样的缺陷,使笔者不得不把关注点从经济因素转向政治因素。

### 2. 机制2:民主通过改变官员行为影响贸易政策

与关注经济行为的学者不同,这一领域的学者基于选民驱动(voter-driven)的逻辑,更强调政治制度变化对官员偏好与选择的影响。选民驱动的逻辑合理性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第一,所有官员在多种利益群体的压力下进行决策;第二,民主政体相对威权政体而言,会更加积极地回应社会的需求。从这两个基本假设出发,这类文献对民主与贸易政策关系的论述看上去颇具说服力。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与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与地区,国内资本密集型部门属于进口竞争型部门,因而支持保护性的贸易政策。相反,由于这些国家在劳动力方面具有禀赋优势,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将惠及国内劳动密集型部门。因此,在欠发达国家中,资本所有者常常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劳工——特别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工群体——则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当选民资格从少

① 欠发达国家,在英文中为 less-developed countries,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意思。目前西方文献中多用“欠发达国家”这一名词,指代以前常说的发展中国家。

② G. Clarke, “How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Economic Factors Impact Technological Deepe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3(2001): 1097-1118.

③ A. A. Levchenko,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4(2007): 791-819.

④ D. Berkowitz, J. Moeinius, and K. Pistor, “Trade, Law, and Product Complex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8.2(2006): 345-352; J. Anderson, and D. Marcouiller, “Insecurity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4.2(2002): 342-352.

数精英扩展到全体公民时,“中位选民的偏好从理论上而言,更容易落到支持贸易自由化的非技术型工人群体中”。<sup>①</sup> 为了能够维持执政权,政治家更倾向于迎合这些选民的需求。所以,在欠发达国家中,越是民主的国家,贸易政策便越是开放。<sup>②</sup>

这一看似合理的因果机制背后,实则存在一个令人质疑的假设:在欠发达国家中,非技术工人容易被有效地动员起来,对官员决策施加压力。这一假设的不合理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很明显的,这一工人群体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生活在欠发达国家的非技术工人,都将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受益人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贸易政策对于每个工人而言,可以看作一种公共物品。所以,每个工人都有搭便车的动机,而对工人的集体性动员,也将难以有效地实现。<sup>③</sup> 第二,虽然对一个欠发达国家而言,提高关税所要付出的潜在代价是巨大的,但是这种代价分配到每个工人身上,却只是边际性的,并且不会在短期内见效。因此,关税提高并不一定会为工人行动提供足够的激励。第三,欠发达国家的工人群体特征,降低了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力。通过对亚洲等国的研究发现,由于教育的缺乏、工作偷懒现象严重以及大部分为女性职工等因素,欠发达国家中的工人很难被有效组织起来。<sup>④</sup> 另外,欠发达国家中存在的大量劳动剩余,也是导致工人群体失声的原因之一。路德拉(Rudra)指出,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这些国家工人的可替代率大大提高,从而有利于分化与瓦解工人内部的团结性,降低工人的动员能力。<sup>⑤</sup>

退一步来说,即使工人群体能够被有效地动员起来,由于不对称信息问题的存在,他们也不一定会在贸易政策上进行游说。通过对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的36501个选民进行调查,古辛格(Guisinger)从根

本上批判了选民驱动的逻辑。他指出,选民驱动逻辑的实现,一个基本条件是信息的完全对称性。然而,事实上,“大部分选民根本不知道他们支持的政客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sup>⑥</sup> 因此,选民在贸易政策上的决定性作用是值得深深怀疑的。

综上所述,由于欠发达国家中工人群体的种种特征,使得这一群体无法成为影响一国贸易政策的决定性变量,而建立在这个因果机制之上的民主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新反思。本文认为,在欠发达国家中,即使在民主体制下,资本所有者依然是影响贸易政策的主要力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为什么资本所有者更具有影响力?他们又是如何施加影响的?这些问题将在下一个部分进行说明。

## 二、资本所有者、腐败与保护主义

加勒特(Garrett)曾明确指出,“民主在一方面的确会使领导者对公民更加负责,通过提高贸易自由化来扩大全社会的福祉,然而在另一方面,民主也会赋予分配性联盟更多的利益,使高度的保护主义更容易实现”。<sup>⑦</sup> 因此,在民主化的欠发达国家中,不仅社会劳工力量影响着政策的制定,资本所有者同样会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在这一部分,本文指出,由于资本所有者组织规模小、选择性激励充沛,他们比劳工更容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在资本所有者影响政府的多种途径中,政商之间的腐败关系,是其中较容易观测的途径之一。因此由政商关系产生的腐败程度,可以用来作为本文测量资本所有者影响政府的一个代理变量。

为什么相较于劳工,资本所有者在欠发达国家中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如果把劳工同资本所有者的特征做一些简单的对比,这个问题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① A. Guisinger, "Determining Trade Policy: Do Voters Hold Politicians Accountab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3(2009, summer): 554.

② F. Giavazzi, and G. Tabellin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2(2005): 1297-1330; H. V. Milner, and K. Keiko, "Why the Move to Free Trade?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2005, Winter): 107-143.

③ M.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④ F. C. Deyo *Beneath the Mirag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G. Gereffi,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Global Change, ed. Regional Response*, Barbara Stallings, 100-4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lice Ingerson, "The Textile Industry and Working Class Culture," *Labor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ed. Charles Bergquis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84) 217-42.

⑤ N. Rudra,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2(2002): 411-445.

⑥ A. Guisinger, "Determining Trade Policy: Do Voters Hold Politicians Accountab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3(2009, summer): 553.

⑦ G. Garrett, "The Causes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6-7(2003): 973.

同为数众多的劳工相比,每个行业中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数量要少得多。而在欠发达国家中,资本密集型部门属于要素稀缺部门,组成这一部门的规模性企业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同劳工相比,资本所有者作为小规模群体更容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在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所有者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降低关税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同提高关税给他们带来的收益是同样巨大的。不难想象,这种成本—收益的差额正为资本所有者联合起来提供了充足的行为激励,使他们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影响决策。必须要承认的是,资本所有者影响政策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通过贿赂等各种腐败的方式同政客建立关系,也是其中常见的一种。然而,要是以政商之间的腐败关系作为衡量资本所有者影响政策的代理变量,下面需要回答的问题便是,在民主化的欠发达国家中,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会冒着失去选票的危险与资本所有者联合?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在民主化的欠发达国家中,政策制定者的选战活动,同样需要资金的大力支持,而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便是这些国内的资本所有者。第二,虽然降低关税给资本所有者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是提高关税后给每一位工人带来的成本却是不平均的,因此关税的单位变化并不一定会对工人的投票偏好产生严重影响。更重要的是,参选的政治人物可以通过多种政策组合来操纵选民的偏好,将他们的焦点从贸易政策上转移出去。<sup>①</sup>

在欠发达国家中,不成熟的制度安排与民主化过程,也为政策制定者与资本所有者的腐败提供了有利条件。基弗(Keefe)指出,在不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因为能力不足的政治参选者对商人政治献金的依赖

程度更高,所以这些国家的腐败更容易产生。最终,政策安排不是为了公共福利的扩展,而是为了寻租、创租而制定。<sup>②</sup>塔瓦雷斯(Tavares)进一步指出,在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宪法、法律的修改过程中,也为腐败创造了机会。<sup>③</sup>葛迪思和里贝罗(Geddes and Ribeiro Neto)以巴西为例在这一点上进行了阐释。自1985年以来,巴西民众对政府腐败的认知持续攀升。他们认为,导致腐败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宪法规则的不确定性,使法律惩戒对腐败行为毫无威慑力可言。<sup>④</sup>“对腐败惩戒的威慑力越低,政客收受贿赂的动机就越大”。<sup>⑤</sup>因此,在新兴的民主国家中,腐败很容易随着改革而变得猖獗。

综上所述,在欠发达国家中,腐败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方式,使他们建立起与政策制定者的联系,并以此来影响政府决策。因此,本文的核心假说可以概括如下:在欠发达国家中,保持其它变量恒定不变,资本所有者<sup>⑥</sup>的影响越大,即一个国家政商之间的腐败程度越高,该国贸易开放度越低。<sup>⑦</sup>

###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阐释

#### 1. 分析单位与变量解释

分析单位:本文以世界179个欠发达国家从1995至199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假说验证,因此,本文的分析单位是“国家·年”。

因变量:从本文的核心假说可知,本文的因变量是“贸易开放程度”。对贸易开放程度的测量,本文采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米尔纳(Milner)的方式,以一国的平均法定关税税率(statutory tariff rate)对贸易开放度进行测算。<sup>⑧</sup>

自变量:根据前文所述,本文的自变量是“资本所

① D. Y. Kono, “Optimal Obfuscation: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Transparen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3(2006): 369–384.

② P. Keefe, “Democratization and Clientelism: Why Are Young Democracies Badly Governed?”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5, Vol. 3594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③⑤ S. C. Tavares, “Do Rapid Political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s Increase Corrup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3(2007): 1053–1076.

④ B. Geddes, and A. Ribeiro Neto,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orruption in Brazil,” *Third World Quarterly* 13(1992): 641–662.

⑥ 根据前文所述,“资本所有者”在本文中特指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资本所有者。

⑦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欠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差异性。的确,正如匿名审稿人提出的那样,有些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但是,可以基本肯定的一点是,在每个欠发达国家内部,其资本密集型部门相对其劳动密集型部门更不具有竞争力,因此,相对而言更倾向于保护政策。另外,在欠发达国家之间,由于贸易竞争的比较优势多产生于自然禀赋因素,而并不与腐败具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因此,存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之中的竞争优势差异,可以被视为是产生于一个随机的过程。由这一因素,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反映在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上(error term)。感谢匿名审稿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

⑧ H. V. Milner, and K. Keiko, “Why the Move to Free Trade?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2005, Winter): 107–143.

有者的影响”,以“腐败程度”作为其代理变量(proxy)。腐败,用最简单的方式理解就是“公权私用”。在国际上,有三种不同的数据来源对一国的腐败程度进行评估。第一种是由世界银行发布的“腐败指数”(the indicator of Corruption)。然而,这一数据库的重大缺陷在于其数据不足。世界银行发布的这一指数,从1996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测算。如果使用这一数据库,本研究只能获得1996年和1998年两年的数据。第二种数据来源是由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从1995年开始,透明国际每年发布一次这一指数。该指数区间由0至10,数字越高表示腐败感知程度越低,该国政府越清廉。必须要承认的是,在本研究中,这一数据存在的主要缺陷在于,该指数测量的是民众对政府腐败的感知程度,并不是对政商之间腐败关系的直接测量。第三种数据来源是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中的腐败指数。这一指数的产生,基于专家对政府腐败程度的评定。该指数的优势不仅在于其涵盖时间跨度之大,所涉国家之多,更重要的是,这一指数主要关注的是“在政商之间实际存在的与潜在的各种形式的腐败行为,其中包括政治献金、裙带关系、隐秘的党派赞助等等”。<sup>①</sup>这一指数区间由0至6,数字越大,表明腐败程度越低。因此,本文将主要采用这一指数,对假说进行验证。同时,借用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指数对验证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利用这些数据对腐败进行测量,依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除了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资本所有者有可能会对政府施加压力以外,是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本所有者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sup>②</sup>第二,这里指出的腐败程度,究竟又有多少是与贸易政策相关的呢?对于第一个问题,格罗斯曼(Grossman)与惠尔普曼(Helpman)的经典文章《销售保护》(Protection For Sale)或许可以给人一定启示。他们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常常通过“以金钱换保护”的方式影响政府,推行与选民偏好相反的贸易保护政策。<sup>③</sup>由此可见,在本研究中,由于大多数欠发达

国家的劳工倾向于开放型的贸易政策,因此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资本所有者只有通过政府对强有力的影响力,才有望从政府获得保护,最终降低国家贸易的开放性。所以,虽然不能否认腐败同样会在政府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资本所有者之间产生,但是同样有理由相信,处于选票弱勢的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资本所有者,更会千方百计地直接建立起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第二个问题,必须要承认的是,无法从这些腐败指数中剥离出只同贸易政策相关的腐败行为。而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精确吻合本文假设的数据库并不存在。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数据依然可以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加以使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对于资本所有者而言,贸易政策是关系其存亡的重大问题。因此,寻求贸易保护政策,就应当是他们向政府施加影响的核心内容之一。

控制变量:除了腐败程度,需要控制的其他变量还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国家规模、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组织的影响以及政治领导人的个体影响。对这几个变量的测量,简要介绍如下:

政治制度:本文借助格尔等人(Gurr et al.)对政治体制的测量方式,对这一变量进行测量。在他们的测量方式中,每个国家在民主特质与威权特质方面都有一个从0到10的指数,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特征,就是通过这两项之差得以计算的,即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民主特质得分-威权特质得分。这一测量方式的区间变化为从-10到+10,数字越大表示该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特征越明显。

经济发展程度:本文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进行简单的测量。

国家规模:对国家规模的测量,本文通过采用一国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的方式进行测量。

经济危机的影响:本文在时间跨度上,刚好涵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期,所以经济危机对一个国家贸易开放程度的影响应当被纳入考量范围内。当以下两个条件满足其一时,在该国视为存在经济危机:当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不低于40%,并且以每年不低于

① <http://www.icrgonline.com/page.aspx?page=icrgmethods>.

② 再次感谢匿名审稿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

③ G. M. Grossman, and Helpman E., "Protection for Sal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4 (1994): 833-850.

25% 的速度增加时,或者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不低于每年 15% 的速度降低时。危机的产生,还可以体现在国际收支方面。当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降至低于该国三个月的进口额时,该国存在经济危机。<sup>①</sup>

国际影响: (1) 如果在当年,该国同 IMF 签订了相关合约,则 IMF 的影响值记为 1,否则为 0。IMF 影响越大,贸易开放性程度可能越高; (2) 在美国的影响方面,以该国同美国的进出口额占该国全球进出口额的百分比进行测算,比值越高,受美国影响越大,该国的贸易开放度越高。 (3) 在 WTO 的影响方面,如果一国是 WTO 成员国,则记为 1,否则为 0。该值越大,其贸易开放程度越高。

$$\text{Tradeopeness}_{i,t} = \beta_0 + \beta_1 \text{ICRG}_{i,t} + \beta_2 \text{Demo}_{i,t-1} + \beta_3 \text{LnPOP}_{i,t-1} + \beta_4 \text{GDPDG}_{i,t-1}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在这个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其他的控制变量逐个放入模型中去,进而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影

$$\begin{aligned} \text{Tradeopeness}_{i,t} = & \beta_0 + \beta_1 \text{ICRG}_{i,t} + \beta_2 \text{Demo}_{i,t-1} + \beta_3 \text{LnPOP}_{i,t-1} + \beta_4 \text{GDPPC}_{i,t-1} + \beta_5 \text{ECCRISIS}_{i,t-1} \\ & + \beta_6 \text{BPCRISIS}_{i,t-1} + \beta_7 \text{IMF}_{i,t-1} + \beta_8 \text{US}_{i,t-1} + \beta_9 \text{WTO}_{i,t-1} + \beta_{10} \text{OFFICE}_{i,t-1} + \mu_i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2)$$

在这两个回归模型中,Tradeopeness<sub>i,t</sub> 表示国家 i 在 t 年的贸易开放程度。t - 1 表示该变量在滞后一年的值。对于 ICRG 的腐败指数,之所以没有采用滞后一年的值,是因为该腐败指数选取的是每年 1 月份发布的数据,因此,可以判断该数据是根据一国上一年的腐败情况进行测算的。另外,本文通过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稳健性测量。

值得指出的是,使用面板数据常常会违反 OLS 的一些基本假设。<sup>④</sup> 本文将采用异质稳健标准误(heteroskedasticity - robust standard error)来降低面板数据异质性问题。同时,本文还将通过国家固定效应(country fixed effect)与时间趋势(time trend)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缺失变量(missing variable)的问题。

另外,在这些变量中,腐败与政治制度两者具有潜在的共线性问题(the problem of multicollinearity)。事实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可能完全消除。因

政治领导人:一些学者认为,政治领导人个人立场的变化也会影响一个国家贸易政策的变化。然而,很难对各国领导人个人立场的变化程度进行准确的测量。本文借助米尔纳与久保田(Milner and Kubota)的测量方式,对这一变量进行考量,即一个政府的执政年数。<sup>②</sup> 不过,米尔纳与久保田也承认,这一变量的测量方式仍然值得商榷。

## 2. 回归模型

本文将使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假说进行验证。先行研究表明,政治体制、国家规模与经济发展程度对一国贸易政策的影响有统计显著性,<sup>③</sup> 因此本研究的基准模型如下:

响显著性的变化。因此,这一过程的规范公式如下:

此,只要该问题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就无需采取额外的统计方式加以解决。在考察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时,通常使用 VIF 的测量方式。在统计学中,只要 VIF 值低于 5,则认为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 1 对 VIF 的测量显示,腐败与政治制度两者之间的 VIF 值远低于 5。

表 1 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VIF	SQRT VIF	Tolerance	R-Squared
ll corr	2.42	1.56	0.4128	0.5872
ll polity	2.13	1.46	0.4703	0.5297
ll gdp_pc	2.43	1.56	0.4113	0.5887
ll lnpop	1.67	1.29	0.5983	0.4017
ll ecris2	1.16	1.08	0.8608	0.1392
ll bpc1	1.12	1.06	0.8961	0.1039
ll signed	1.07	1.03	0.9389	0.0611
ll gatt_wto_new	1.15	1.07	0.8669	0.1331
ll usheg	1.55	1.24	0.6457	0.3543
ll office	1.97	1.40	0.5081	0.4919
date	1.66	1.29	0.6022	0.3978
Mean VIF		1.67		

①②③ H. V. Milner, and K. Keiko, "Why the Move to Free Trade?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2005, Winter): 107 - 143.

④ N. Beck, and K. K. Jonathan, "What to Do with Trade Time - Series - Cross - Section Data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1995): 634 - 647.

那么,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呢?也就是说,该研究核心假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一种逆向的可能?通常来说,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第一,将自变量滞后一定时期;第二,通过选取工具性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部分加以控制。本文选取第一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内生性问题进行解决,即对自变量均采用滞后一年的值对假说进行验证。

#### 四、统计结果与分析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首先以基准模型为基础对

假说进行验证,然后将其他的控制变量逐一放入模型内进行考察。从表2中可以看到,腐败程度与贸易开放度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除了国际收支因素以及政治领导人因素的影响外,这种显著关系基本不受其他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腐败程度越高,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越低。由于腐败程度在本文中是资本所有者影响的代理变量,所以负相关的关系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影响力越大,该国贸易开放程度越低。于是,本文的核心假说得以验证。下面本文将对统计结果进行详细的分析。

表2 影响贸易政策的因素

变量	(1)	(2)	(3)	(4)	(5)	(6)	(7)
腐败程度(ICRG)	-0.986*	-1.013*	-0.878	-0.982*	-0.994*	-0.829	-1.052*
	(0.525)	(0.531)	(0.552)	(0.528)	(0.529)	(0.555)	(0.534)
政治制度	0.397	0.409	0.239	0.400	0.387	0.413	0.392
	(0.350)	(0.352)	(0.376)	(0.352)	(0.356)	(0.370)	(0.351)
国家规模	-21.88	-23.30	-23.95	-21.93	-22.91	-49.45	-23.76
	(24.37)	(25.47)	(29.24)	(24.47)	(24.70)	(35.21)	(24.35)
GDP	0.000628	0.000826	0.000479	0.000642	0.000604	0.00119	0.000728
	(0.000861)	(0.000855)	(0.000923)	(0.000868)	(0.000855)	(0.000998)	(0.000856)
通货膨胀		-0.272					
		(0.893)					
国际收支			-0.786				
			(0.722)				
WTO				0.487			
				(1.055)			
美国因素					-10.85		
					(30.25)		
政治领导人						-0.0590	
						(0.0790)	
IMF							0.0559
							(0.583)
Date	-0.399	-0.436	-0.281	-0.404	-0.321	0.0353	-0.357
	(0.494)	(0.522)	(0.608)	(0.497)	(0.572)	(0.719)	(0.495)
Constant	1,198*	1,297**	1,003	1,209*	1,065	824.8	1,149*
	(607.4)	(639.6)	(743.3)	(614.2)	(781.7)	(889.1)	(610.7)
Observations	228	227	217	228	228	190	225
R-squared	0.911	0.911	0.916	0.911	0.911	0.923	0.911

注:系数下括号内值为异质稳健标准误;所有模型包括了国际固定效应、线性时间趋势;\*表示0.1的显著水平,\*\*表示0.05的显著水平,\*\*\*表示0.01的显著水平。下表同。

统计结果的第一列数据显示,ICRG 腐败指数同关税税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根据前文对 ICRG 数据的说明,ICRG 数据越高,表明该国腐败程度越低,这正好验证了本文假说的预测。当把腐败程度纳入考量之后,在先行研究中显著的变量,如政治体制、国家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都失去了其统计显著性。这样的结果,否定了先行研究对民主与贸易开放性的正相关判断。

以第一列数据结果为基础,本研究首先将以通货膨胀来测量经济危机的变量放入模型中。在第二列的统计结果显示,这一变量对于本研究核心假说所考察的因果关系没有影响。相反,由于这一变量的引入,甚至还提高了腐败程度对贸易开放的影响程度。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腐败程度这一变量的系数,从基准模型的 0.986 提高到了 1.013。这一结果否定了贸易政策同经济危机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统计结果中,国际收支这一变量对于验证核心假说的影响是耐人寻味的。国际收支在本文中是考察一国经济危机存在与否的第二种方式。当把这一变量放入模型中后,所有自变量失去了与因变量之间的统计相关性。因此,由于不能剔除任何一种零假说 (null hypotheses),所以无法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确立任何统计关系。

WTO、美国因素与 IMF 对一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也并不明确。有研究认为,在欠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制定中,世界贸易组织、IMF 和美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然而从本研究的统计结果看来,这种论点并不稳健,而且对这些变量的引入,并不影响腐败与贸易开放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同国际收支对假说的影响类似,当把一国政治领导人立场的变化这一变量放入统计模型中时,腐败失去了同贸易政策的负相关关系。然而,政治领导人究竟发挥着如何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正如前文所说,毕竟对这一变量的测量还并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很难对政治领导人的立场与贸易开放性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结论。

表 3 对表 2 的统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验证。在表 3 中,腐败程度是通过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来进行测量的。同表一显示的结果相同,腐败感知指数同税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由于腐败感知指数越高,表明一国腐败程度越低,所以该结果同样验证了腐败程度与贸易开放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所有稳健性验证的数据列中,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放入什么样的控制性变量,对于核心假说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任何影响。

表 3 影响贸易政策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 自变量	税率						
	(1)	(2)	(3)	(4)	(5)	(6)	(7)
腐败程度 (CPI)	-1.191 ** (0.489)	-1.289 ** (0.542)	-0.860 * (0.451)	-1.188 ** (0.494)	-1.191 ** (0.489)	-1.182 ** (0.505)	-0.838 * (0.464)
政治制度	-0.131 (0.559)	-0.233 (0.604)	-0.224 (0.548)	-0.171 (0.609)	-0.131 (0.559)	-0.121 (0.576)	-0.523 (1.314)
国家规模	1.161 (26.73)	1.686 (25.89)	36.06 (36.17)	1.355 (27.49)	1.161 (26.73)	1.781 (28.07)	22.46 (37.51)
GDP	0.000874 (0.00103)	0.000621 (0.00105)	0.000453 (0.00106)	0.000966 (0.000942)	0.000874 (0.00103)	0.000914 (0.00109)	0.000584 (0.00144)
通货膨胀		-0.759 (0.958)					
国际收支			-0.0857 (0.741)				
IMF				-0.318 (1.064)			
WTO						-2.487	



(续表)

因变量 自变量	税率						
	(1)	(2)	(3)	(4)	(5)	(6)	(7)
					(82.07)		
美国因素						15.15 (120.4)	
政治领导人							0.479 (0.713)
Date	-1.135** (0.459)	-1.195** (0.459)	-1.462** (0.706)	-1.169** (0.481)	-1.135** (0.459)	-1.330 (1.577)	-1.607 (0.963)
Constant	2.261*** (726.1)	2.374*** (762.3)	2.290** (909.6)	2.325*** (687.0)	2.264*** (727.1)	2.634 (2.929)	2.825 (1.752)
Observations	90	90	79	90	90	90	58
R-squared	0.961	0.962	0.979	0.961	0.961	0.961	0.983

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假说得到验证,即在欠发达国家中,保持其他变量恒定不变,资本所有者的影响越大,即一个国家政商之间的腐败程度越高,该国贸易开放度越低。

### 五、反思与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民主化与贸易自由化席卷了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先行研究指出,在民主制度与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本文指出,这一观点的核心缺陷在于对劳工力量的过分估计,以及对资本所有者力量的低估。由此,本文认为,在欠发达国家中,即使民主客观上为劳工向政府施加影响开辟了制度性渠道,然而他们却由于自身的特征而难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相反,资本所有者由于组织规模小以及选择性激励充足等优势,更有动机与能力影响决策。因此,民主制度本身对于贸易政策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通过对世界179个欠发达国家1995年到199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显示,当把资本所有者的影响放入考量中去的时候,民主与贸易政策的关系便不复存在。而资本所有者的影响同贸易开放性的负相关关系,却是较为稳健的。在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本文以政商之间的腐败程度作为测量资本所有者影响决策的代理变量。

本研究的一项基本启示在于,制度的变迁并不一

定会带来人们行为的变化。根据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人们的行为选择受制于制度的约束。制度的变迁将会引起人们行为的变化。正是在这一制度理论的逻辑影响下,才使先行研究认定民主化与贸易开放在欠发达国家中的正相关性。然而,制度发挥作用或许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制度可以按照其设计的预期来实行,即制度具有一定的成熟度;第二,人们认可并重视新制度的规则,即制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中,虽然基本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其民主的质量却时常遭到诟病,而大众参与的有效性更是长期受到质疑。一个可能的因素就是,虽然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发生了改变,但政府的治理制度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sup>①</sup>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在这些国家的大众能够利用民主渠道,实现对自身利益的有效维护。这就提醒了我们,比起研究制度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发现藏在制度背后的“政治”。

出于多种限制性因素,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资本所有者对政治的影响渠道是多样的。腐败虽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今后的研究仍需将更加多样的途径纳入分析当中;其次,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本文所选的时间跨度较短,在今后的研究中,仍需将本文的结论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加以验证与反思。

<sup>①</sup> 再次感谢匿名评审人对这一要点的指出。

**Capital Owners , Corruption and Trade Policy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 LDCs)**

CHEN Chao

*( Division of Political Study ,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have been spreading across LDCs since 1990s.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suppor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trade openness in LDCs. In this article , however , I argue that even though democracy institutionally opens an avenue for labors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on politician ,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be effectively organized. On the contrary , capital owners are more influential for their small size of group and enough selective incentive. Therefore , democracy *per se* has less to do with final trade policy than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 owners does. Among various ways to exert capital owners' influence on politicians , corruption is a feasible and effective one. Thus , in this study , I use the corruption as a proxy of influence of capital owners. Then I argue that in LDCs , holding other variables constant , the more influence of capital owners is , e. g. the more corrupted a country is , the less open its trade will be. One basic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can be seen that the transition of formal institu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 of people's behavi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ormal institution depends on at least two factors: the degree of maturity and public acceptance. Therefore , it is more meaningful to discover the real "political operations" beneath the formal institution rather than the institution itself.

**Key words:** less-developed country; democratiz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capital owner; corruption

[责任编辑 刘 慧]

(上接第 105 页)

些人员 助长被没者地位的回升。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 蕴藏着中古社会的阶层结构“扁平化”的大趋势:处于阶层结构顶端的君主集团 不得不利用官僚实施统治,又始终对官僚集团中蕴含的颠覆力量深怀忧惧,总会抓住一切机会清除异己,将他们整体性地驱逐至社会底层。另一方面,君主不时地从奴婢等底层人

士中吸收有能力者,以助力其统治。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阶层结构的顶端,君主消灭了所有有能力反对他的人之后,也变得越来越封闭、缺乏改革的能动性;在阶层结构的底层,则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及其他有能力者,导致其总体水平的抬升;而作为君主辅佐的军功集团和文士集团,则从原先的中层集团,越来越靠近于社会底层,从而使社会趋于扁平化。

**Enslaving Law and Social Mobility of the Tang Dynasty: Concurrently  
on the Flattering Tendenc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Age**

CHEN Ling-hai

*( Research Institute of Legal History ,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Shanghai 200127 , China)*

**Abstract:** The enslaving law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as inherited by the Tang Dynasty and be changed more systematically in terms of Lv (律) and Ling (令). However , its operation is seemed contradictory. On the one hand , the legislators and the judges often expanse the field of the enslaving law and take severe measure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the victim's family , even if it was illegal. On the other hand , the legal status of slaves entered into an overall increase orbit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mobility , the enslaving law forced people from the top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o the bottom , from the center to the boundary. But there were another flow direction what was based on the amnesty law. It's important to combine these hidden trends behind the social structure that we can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se contradictory phenomenon.

**Key words:** enslaving law; pariah; status law; social mobility; law of Tang Dynasty

[责任编辑 陈文彬]